

## 明清士人對「評點」的批評

侯美珍\*

### 一、前言

關於「評點」這種特殊的批評形式，在明中葉以後，蔚為流行。但贊成和反對的爭議，伴隨著評點的發展，卻也未曾止歇過。

相較於其他的批評方法，評點乃就原文而加圈點批評，頗便於誦習，所以明代的科舉用書，如時文選本、科舉講章，遂普遍地採用評點的形式，對評點的發展產生了推波助瀾的效果。

由於明中葉後，小說、戲曲等通俗文學逐漸盛行，經徐渭(1521-1593)、李贄(1527-1602)、湯顯祖(1550-1616)和陳繼儒(1558-1639)等人的努力，將評點施用於小說和戲曲上，成為評點隊伍中後來居上的生力軍。清初，出版商仍視評點為打開市場的手段，且承李贄、金聖嘆(1608-1661)等人的流風，小說、戲曲的評點，繼續蓬勃的發展著。然許多知識分子有鑑於明代之失，提倡實學、經世文風，小說、戲曲大都為大雅君子所罕言、《四庫》所不道，士大夫既鄙視小說戲曲的價值，故對小說戲曲的評點，也不屑多言。

時文、科舉講章既然向來就為有識之士所不齒，而清代的士人也大多不認同小說、戲曲之類的俗書，故這些書籍，雖然是施用評點的最大宗，但當時的大雅之士既已置之不問，亦不遑論及施用評點是否妥當。是以當時的爭議大都集中在時文、科舉講章、小說戲曲以外的書籍，是否宜施用於評點上<sup>①</sup>。故本論文所論述的範疇

\* 侯美珍，臺南女子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。

① 如〔清〕章學誠〈清漳書院留別條訓〉斥評點之失，然特別強調此乃專就「詩古文辭」用評點的現象而言：「至於舉業成文，則自有明以來，圈點批評，固已襲用詩古文辭陋習。創始之初，先已如是，雖名門大家魁壘選本，亦從未聞出其範圍。」見《章學誠遺書》（北京：文物

亦以時文、科舉講章、小說戲曲以外的書籍為主，探討明清士人對「評點」此一批評形式的評價，考察時人贊成或反對經史、詩文集等施用評點的原因何在。

## 二、評點的起源與發展

評點，或云「批點」、「圈評」，原為一種士子讀書時，隨手於書上筆記，或旁批、或眉批、或尾評，或抹、或圈、或點，以標示書中精義、心得的讀書習慣，師長課業時亦以評點來要求子弟，在元代程端禮(1271-1345)《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》卷一中，也提到士子讀經時，要博觀諸註本，加以比較，「異者，以異色筆批抹」或「其未合者，以異色筆批抹」；卷二則有〈批點經書凡例〉、〈批點韓文凡例〉，論述閱讀時如何句讀、點抹、畫截、施色，介紹甚為詳細，並教人如何使用材料製作圈點用的「點子」②。

後來，評點逐漸演變為一種批評形式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簡述了評點的起源與發展：

宋人讀書，於切要處率以筆抹。故《朱子語類》論讀書法云：先以某色筆抹出，再以某色筆抹出。呂祖謙《古文關鍵》、樓昉《迂齋評註古文》，亦皆用抹，其明例也。謝枋得《文章軌範》、方回《瀛奎律髓》、羅椅《放翁詩選》始稍稍具圈點，是盛於南宋末矣。③

今所流傳的文獻中，南宋呂祖謙(1137-1181)、樓昉、謝枋得(1226-1289)等所編的古文選本，是較早採用評點的形式刊印以教士子作文、備考之作，可見評點興起之初即與科舉有密切的關係。而至明朝評點之風益熾，與八股文取士的科舉制度密切相關。

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頁673。可見時文選本用評點，已是見怪不怪，無庸爭議的課題。按：據《章學誠遺書》頁六八八編輯註，〈清漳書院留別條訓〉乃編者「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《章氏遺書》章華絨鈔本補」，劉承幹所刻《章氏遺書》（臺北：漢聲出版社，1973年影印吳興劉承幹嘉業堂刊本），未收。

②〔元〕程端禮：〈所用點子〉，《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5年，《叢書集成新編》影印《正誼堂全書》本），卷2，頁30。

③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89年），卷37，頁1，「蘇評孟子」條。按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以下簡稱《總目》。

八股文，又稱「時文」，又有「八比」、「制藝」、「時藝」、「時義」、「經義」、「舉業」、「舉子業」、「四書文」諸名稱，乃是以經書為出題範圍，解釋、闡述經書義理的論說文字。自明初，科舉定以八股文取士後，士子備考，往往得背誦許多的八股文，時文選本的盛行<sup>④</sup>，乃源於應考士子的大量需求。藉著閱讀這些選本，一方面習得寫作八股文技巧，一方面掌握時下文風趨向。

明張肅對於如何看先輩的時文佳作，曾說：

先輩文惟制科中程者，字無虛設，如高曾規矩，的確不移，其詳略偏正，開闔呼應，有上句自然有下句，有前股自應有後股，非特法度固然，即作者亦不知其然，所謂靈心化工也。文章家每於神清氣定時，將先輩程墨細批細玩，何處是起，何處是伏，何處是實，何處是虛，何處是轉摺，何處是關鎖，何處是提挈，何處是詠嘆，看其一篇是何成局，伏習眾神，後來自然脈脈相接也。<sup>⑤</sup>

時文中的詳略、偏正、開闔、呼應，起伏、實虛、轉摺、關鎖等等，這些作文法度、技巧，並非一般的士子皆可看出這些行文的奧妙，並加以學習、模仿，於是評選者藉評點為手段，將文章的優劣、可取法處，詳細指點出來，使士子在讀這些時文選本時，不致泛泛、不明究理地輕易讀過。如清初呂留良(1629-1683)所評選的時文，行間有點、圈、抹、旁批，段落處畫截，而文末附以尾評<sup>⑥</sup>，即是其例。因此，時文選本遂與評點手法緊密的結合。

由於八股出題的範圍有限，許多讀書人棄經書不讀，多由擬題下手，只背誦範文以應考，往往僥倖中式。故顧炎武(1613-1682)慨然嘆道「八股行而古學棄」，

<sup>④</sup> 時文選本盛行之狀況，可參劉祥光：〈時文稿：科舉時代的考生必讀〉，《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》第22期（1996年9月），頁49-68。

<sup>⑤</sup> 〔明〕張肅：〈論文三則〉，葉慶炳、邵紅輯：《明代文學批評資料彙編》（臺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81年），頁277。

<sup>⑥</sup> 參〔明〕艾南英撰，〔清〕呂留良輯評：《艾千子先生全稿》（臺北：偉文圖書公司，1977年影印清康熙天蓋樓刊本）。因時文選本旋生旋滅的特色，加上清末廢除以八股文取士，時文選本也失去了價值，故昔日充棟的時文選本，傳世並不多。唯呂留良因名氣頗大，傳世時文的評選本亦較可觀，收於《四庫禁燬書叢刊》（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00年）經部第七冊的有《楊維節先生稿》、《錢吉士先生全稿》、《艾千子先生全稿》、《章大力先生稿》等。傅斯年圖書館又藏有呂氏所評選的《陳大士先生稿》、《章大力先生稿》、《羅文止先生稿》、《十二科程墨觀略》等，皆為康熙天蓋樓刊本，亦皆為結合評點的時文選本。

「秦以焚書而《五經》亡，本朝以取士而《五經》亡」，「八股之害等於焚書，而敗壞人材，有甚於咸陽之郊，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」<sup>⑦</sup>。雖稍嫌言過其實，但透露出許多有識之士，對時文選本提供士子揣摩、捷得之道的反感。

除時文外，當時多數的「高頭講章」等科舉用書，亦常見編撰者用圈評來輔助解說，因為用於解說時文的評點方式，施之於高頭講章亦甚便利，可以「為學者指其精華所在」<sup>⑧</sup>。而這種便於備考的科舉用書，也常為有識者所鄙棄。《總目》即評云：「蓋自高頭講章一行，非惟孔、曾、思、孟之本旨亡，併朱子之《四書》亦亡矣。」故對這類書籍「概從刪汰」。又云：講章「旋生旋滅，有若浮漚；旋滅旋生，又幾如掃葉」，「其存不足取，其亡不足惜，其剽竊重複不足考辨，其庸陋鄙俚亦不足糾彈。……置之不問可矣。」<sup>⑨</sup>

明中葉後，通俗文學逐漸抬頭，經李贄、徐渭、湯顯祖和陳繼儒等人大力推展，將評點的方式，擴展到時興的小說和戲曲上。學者指出，從萬曆前期到明末，各種的戲曲評點本有一百五十種左右<sup>⑩</sup>。小說的評點尤其廣為後人所知，清初承李贄、金聖嘆等人的流風，毛氏父子之評《三國》，張竹坡(1670-1698)之評《金瓶梅》，脂硯齋之評《紅樓夢》等，都是令人側目的焦點。孫琴安將明末清初定位為「評點文學的群星璀璨期」<sup>⑪</sup>，而在這段評點的繁盛時期裏，小說評點可謂為其中最燦爛的花朵。

大凡見諸小說、戲曲評點本之序跋、讀法、凡例等，大都肯定評點的作用，如袁宏道(1568-1610)〈東西漢通俗演義序〉引里人云：《水滸傳》一書，「若無卓老揭出一段精神，則作者與讀者千古俱成夢境」；袁宏道也讚嘆李贄之評，云：「吾安得起龍湖老子於九原，借彼舌根，通人慧性，假彼手腕，開人心胸。」<sup>⑫</sup>

⑦ 以上三則，分見於〔清〕顧炎武：〈書傳會選〉、〈朱子周易本義〉、〈擬題〉，《原抄本日知錄》（臺北：明倫出版社，1970年），卷20、1、19，頁526、4、477。

⑧ 〈四書朱子大全凡例〉：「近日講章皆著圈點，所以為學者指其精華所在也。」〔清〕戴名世撰、程逢儀輯：《四書朱子大全》，收入《四庫禁燬書叢刊》（影印清康熙四十七年〔1708〕程逢儀刊本），經部第9冊，卷首。

⑨ 《總目》，卷36、37，卷末總評。

⑩ 朱萬曙：《明代戲曲評點研究》（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頁11。

⑪ 孫琴安：《中國評點文學史》（上海：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頁175。

⑫ 〔明〕袁宏道：〈東西漢通俗演義序〉，蔡景康編選：《明代文論選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頁330-331。

由於廣受民衆的歡迎，評點本，特別是名家評本，成爲暢銷的保證，書坊常僞稱其出版品爲名家所評，藉此以招徠顧客。因應讀者及市場的需要，吸引更多人投入評點的行列，且隨著時文、科舉講章、小說戲曲的普及民間，評點也成爲大眾習見、熟悉的批評形式了。

### 三、贊成評點之故

贊成評點者，大都取其能抉發作者之意，可作爲讀者了解作者與文本的津筏，有助於提升學習效率、「便於初學」等理由。

鍾惺(1574-1625)言其與譚元春(1586-1637)共同評選的《詩歸》「拈出古人精神」，「一片老婆心，時下轉語，欲以此手口作聾瞽人燈燭輿杖」<sup>⑬</sup>。清初洪若皋亦云：「圈點爲文章杖指。」<sup>⑭</sup>皆以爲初學者目鈍，有如聾瞽之人，圈評有如燈燭輿杖，有指引之效。且「文用評點，取便來學，抉精剔華，使讀者入目了然」<sup>⑮</sup>，標示出重點、關鍵，使讀者觸目顯豁、了然，徐文駒亦言評點可「標舉眉目以示學者」<sup>⑯</sup>，浦起龍云：「書有圈點鉤勒」，使「行間字裏，觸眼特爲爽豁」<sup>⑰</sup>。王鴻漸也讚許樓昉《崇古文訣》「批抹發其關鍵，評點示其肯綮。誠初學之指南，纂文之楷範也」<sup>⑱</sup>。戴名世(1653-1713)又以「舟車」喻評點，曾應學徒之請，評點唐宋八大家之文，「執筆爲著明其指歸，與夫起伏呼應、聯絡賓主、抑揚離合、伸縮之法，務使覽者一望而得之」，冀望「二三子以是書爲文之舟車也」<sup>⑲</sup>。

⑬ [明]鍾惺：〈再報蔡敬夫〉，《隱秀軒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卷28，頁470-471。

⑭ [清]洪若皋：〈文選越裁凡例〉，《梁昭明文選越裁》，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（臺南：莊嚴文化事業公司，1997年影印清康熙名山聚刻本），集部第287冊，卷首。

⑮ [清]吳之彥、刑維信：〈凡例〉，[清]儲欣：《在陸堂文集》，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（影印清雍正元年〔1723〕儲掌文刻本），集部第259冊，卷首。

⑯ [清]徐文駒：〈上新城先生書一〉，《師經堂集》，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（影印清康熙五十一年〔1712〕刻本），集部第265冊，卷6，頁1-4。

⑰ [清]浦起龍：〈發凡〉，《讀杜心解》（臺北：中央興地出版社，1970年），卷首。

⑱ [明]王鴻漸：〈重刻後序〉，《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·集部》（六）（臺北：國立中央圖書館，1994年），頁53，「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」條。

⑲ [清]戴名世：〈唐宋八大家文選序〉，《戴名世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0年），頁64。

姚鼐(1731-1815)認為評點本對學文的啓發很大，云：「震川閱本《史記》，於學文者最爲有益；圈點啓發人意，有愈於解說者矣。」<sup>⑩</sup>張之洞(1833-1909)言評點本「簡潔豁目，初學諷誦，可以開發性靈，其評點處頗於學爲詞章者有益」，故《書目答問》附錄〈群書讀本〉，羅列二十餘種詩文集，皆經評點<sup>⑪</sup>。

徐渭將圈評的作用說得更出神入化，〈四書繪序〉中言及他曾看過岳鄂王祠的壁畫，畫岳王征討撫降諸事，「人馬弓旌馳騫伏匿之勢，行營按壘叩首呼歡相問訊之狀」，「比之尋史冊中語，似更明暢，且動人」。而後讀《內經》，氣穴、經絡等雖百註解說不清的，一看〈明堂圖〉<sup>⑫</sup>，「長縈爲脈，圓孔爲穴，脈穴名字就記其旁，關鍵貫穿，向所不了，一覽而得焉」。這些經驗讓他認識到點畫的妙處，認爲《四書》就像人體的穴脈一樣，用傳註講章說不清的，可以用五色筆施以點抹圈鉤，或隱括數語，將其標識出來：

《四書》中語言，聖賢之精意也。全體似人身有脈絡孔穴，隱藏引帶，不出字句，而傳註講章，轉相纏說，未免床上壘床。乃感前事，始用五色筆繪之，即其本文統極章段字句，凡輕重緩急，或相印之處，各有點抹圈鉤，既以色爲號，復造形相別，色以應色，形以應形，形色所不能加，乃始隱括數語，脈穴之理，自謂庶幾燦然。<sup>⑬</sup>

廖燕(1644-1705)對舊題蘇洵(1009-1066)所評的《孟子》、謝枋得所評的《檀弓》，及茅坤(1512-1602)、鍾惺、金聖嘆等評點大家之作，大加讚美，以爲能闡發作者之精神，發掘作品之深義，所評「無不批竅導竅，鬚眉畢露，殆無餘蘊矣」。認爲諸選本的價值所在，正是選者之評點論次，否則只是抄書。且以「師道」、「友道」、「父兄道」喻之，盛讚評點之功效：

<sup>⑩</sup> [清]姚鼐：〈答徐季雅〉，《姚惜抱尺牘》，收入佚名編：《明清名人尺牘》（臺北：廣文書局，《尺牘彙編》本），頁19。

<sup>⑪</sup> [清]張之洞著，范希曾編，瞿鳳起校點：〈別錄·群書讀本〉，《書目答問補正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），頁338-339。

<sup>⑫</sup> 傳說黃帝坐明堂傳授人體的經絡血脈給雷公，後世醫家稱標明人體經絡針灸穴位之圖，爲明堂圖。參[清]錢曾：《讀書敏求記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65年，《叢書集成簡編》本），卷3，「西方子明堂灸經」條及《總目》，卷103，頁23，「明堂灸經」條。

<sup>⑬</sup> [明]徐渭：〈四書繪序〉，《徐文長三集》，收入《徐渭集》（二）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），卷19，頁521。

選蓋以評而傳也，不然，則亦謂之代抄而已，又何選之足云？故予嘗謂：評文有師道焉，巧亦能與，何況規矩？有友道焉，以筆代舌，而即收文會之功。有父兄道焉，句批字釋，不難取古人而生活之，使子弟有以知其用筆之意，則可以神明而無難。評文之效如此。<sup>②④</sup>

正由於評點有如上所述之作用，許多人在刊印書籍時常不忍捨棄。如舊有《瀛奎律髓》刊本，將圈點刪除，並將註語、序中語及圈點者，皆加以改竄<sup>②⑤</sup>，吳寶芝以為《瀛奎律髓》一書的評點者「皆作家巨子，各具手眼，其所圈識，如與作者面稽印可，能使其精神眉目，軒豁呈露於行墨之間，……學者且當從此領會參入而後漸次展拓，即古人全體之妙，不難盡得。而坊本將圈點削去，且因之竄改註語，不特評者之苦心因之埋沒，即作者之矩矱畦逕，亦難窺尋矣」。故其重刻時，即將圈評悉行載入<sup>②⑥</sup>。

又如姚鼐《古文辭類纂》一書，康紹鏞(1770-1843)所刻本原有批抹圈點，吳啓昌道光年間重刻時，姚氏有感於「批抹圈點，近乎時藝」，命其將康刻本的批點除去。而李承淵光緒年間再刻時，以為「前輩批點，可資啓發」，後學可藉前人批點明句讀、「獲知古人精義所在」，慮及讀者需求，仍錄圈點，以便讀者<sup>②⑦</sup>。吳德旋(1767-1840)曾盛讚：「《古文辭類纂》其啓發後人，全在圈點。」<sup>②⑧</sup>方東樹(1772-1851)認為吳氏刻本去掉姚書原本的「圈識評抹」殊為可惜，圈識評抹是後

<sup>②④</sup> [清] 廖燕：〈評文說〉，王鎮遠、鄔國平編選：《清代文論選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頁400。

<sup>②⑤</sup> 《總目》「瀛奎律髓」條云：「此書世有二本，一為石門吳之振所刊，註作夾行，而旁有圈點，前載龍遵敘，述傳授源流至詳，一為蘇州陳士泰所刊，刪其圈點，遂併註中『所圈是句中眼』等句刪去，又以龍遵原序屢言圈點，亦併刪之以滅蹟，校讎舛駁，尤不勝乙，之振切譏之，殆未可謂之已甚焉。」（卷188，頁7）

<sup>②⑥</sup> [清] 吳寶芝：〈重刻律髓記言〉，《瀛奎律髓刊誤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，《叢書集成續編》影印《懋齋叢書》本），卷首，頁1-2。

<sup>②⑦</sup> [清] 康紹鏞：〈康刻古文辭類纂後序〉、[清] 吳啓昌：〈吳刻古文辭類纂序〉、[清] 李承淵：〈校刊古文辭類纂後序〉，姚鼐：《古文辭類纂》（臺北：臺灣中華書局，《四部備要》據滁州李氏求要堂校本校刊），書後附錄。按：姚鼐對評點有截然不同的論述，或云評點為借徑、啓發人意、於學文最有益；或云圈點是時文陋體、刻古書必不可有圈點。頗為矛盾，疑為前後觀點改變、或語境不同之故。參姚鼐〈答徐季雅〉、〈與陳碩士〉諸書，《明清名人尺牘》，頁19、44、68、69。

<sup>②⑧</sup> [清] 吳德旋：《初月樓古文緒論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頁20。

人學習的途徑，「後人識卑學淺，不能追古人，而又去其階梯，是絕之也」<sup>⑲</sup>。李承淵錄存批點以便啓發後學的作法，與吳德旋、方東樹的主張是一致的。

#### 四、反對評點之故

反對評點，有些是源於對「評點」這特殊批評形式的不滿，有些則針對常見的一些評點流弊而發，這些流弊當然會影響一般人對評點的評價。相較於贊成評點的原因之單純，反對評點的理由顯得多樣，以下分論之。

##### （一）評點為時文陋習

謝章铤云：「點圍乃時文面目，古書無是也。自有時文，此法乃盛行。」<sup>⑳</sup>由於評點常用於時文選本上、與時文選本密切結合，而時文選本又被視為庸陋之最，以致不少「有識之士」，對於書籍施用評點，頗不以為然，所謂「圈點沿時文俗態」<sup>㉑</sup>，認為評點為時文習氣；明末陳衍（1586?-?）<sup>㉒</sup>〈與鄧彰甫〉信中，勸鄧氏去掉書上的批評圈點，因「批評圈點為時套濫觴」<sup>㉓</sup>。清初顧湄也反對詩文「彊加評跋，致落時文蹊徑」<sup>㉔</sup>。曾國藩（1811-1872）認為「圈點者，科場時文之陋習也，而今反施之古書」<sup>㉕</sup>，有所不可。由於時文選本、科舉講章、小說等「俗書」

<sup>⑲</sup> 〔清〕方東樹：〈書歸震川史記圈點評例後〉，《方植之全集》，收入《考槃集文錄》（清光緒中刊本），卷5，頁41。

<sup>⑳</sup> 〔清〕謝章铤：《賭棋山莊筆記，課餘續錄》（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》影印清光緒二十六年〔1900〕刊本），頁23。

<sup>㉑</sup> 〔清〕方濬師：〈序〉，〔明〕王志堅編，〔清〕蔣士銓評：《評選四六法海》（臺北：德志出版社，1963年），卷首。

<sup>㉒</sup> 徐憶農〈陳衍及其《大江集》、《大江草堂二集》〉，言陳氏「當生於萬曆十四年(1586)前後，衍崇禎末年仍在世，卒年不詳」。文見〔明〕陳衍：《大江集》（揚州：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，1996年），卷首。

<sup>㉓</sup> 見〔清〕周亮工評選：《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》，收入《四庫禁燬書叢刊》（影印清康熙賴古堂刻本），集部第36冊，卷1，頁6。

<sup>㉔</sup> 〔清〕顧湄：〈吳梅村詩集箋注凡例〉，《吳梅村詩集箋注》（清光緒十年〔1884〕湖北官書處重鈔本），卷首。

<sup>㉕</sup> 〔清〕曾國藩：〈經史百家簡編序〉，《曾文正公集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52年），第8冊，頁19。



常使用評點，又或譏施用評點的作法為「近俗」<sup>⑩</sup>。

## （二）評點非古制

前已言及，評點漸興於南宋之際，大盛於明中葉時文選本盛行後，本非古制，故許多編撰者，仍守古制，不施圈評，也以非古制的理由來反對評點。如卓爾堪(1653-1715 左右)輯《遺民詩》，「不加圈點，并不載評語。圈點固不合古，評語尤不敢輕」<sup>⑪</sup>。盧世淮(1588-1653)云：「刻詩只以白本為雅，凡加圈點批評，皆是近世惡習，古無是也。」<sup>⑫</sup>周亮工(1612-1672)反對將王猷定(1598-1662)<sup>⑬</sup>的遺稿評點傳世，原因之一是：「點而評之，非古也。」<sup>⑭</sup>曾燦(1626-1698)輯《過日集》，「集中不加圈點評語者，遵古也」<sup>⑮</sup>。錢大鏞、徐龍驤康熙三十一年(1692)作〈明文在凡例〉云：「古本書籍不加圈點批評，欲覽者自得之。近閱坊本，俱照時文、小說密圈密點，妄批妄評，此其人目未睹宋元明初板耳，先生未敢以之薄待天下士也。」<sup>⑯</sup>認為宋、元、明初舊板古書不加圈評，不似後來的坊本，沿時文、小說之習氣，密圈密點，妄批妄評。

## （三）評點未能得作者之意

顧施禎輯《盛朝詩選初集》，不隨選家施以圈評，乃因：「作詩之人，各有興會，性情所至，形於咏言。而選者意為議論，或泛加褒美，殊失作者大旨。」<sup>⑰</sup>吳

<sup>⑩</sup> 如《總目》評《說類》一書云：「其上細書評語，體例尤為近俗。」（卷 132，頁 6）

<sup>⑪</sup> 〔清〕卓爾堪：《遺民詩·凡例》，謝正光、余汝豐編著：《清初人選清初詩彙考》（南京：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8 年），頁 264。

<sup>⑫</sup> 〔明〕盧世淮：〈燕遊稿〉，《尊水園集略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 年影印清順治刻十七年〔1660〕盧孝餘增修本），集部第 1392 冊，卷 8，頁 24。

<sup>⑬</sup> 王氏生卒年此據姜亮夫：《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》（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5 年），頁 490 所考。《清代文論選》：「王猷定（1599-1661，一作 1662）」（頁 35）所言稍有出入。

<sup>⑭</sup> 周亮工：〈王于一遺稿序〉，《賴古堂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影印清康熙刻本），卷 13，頁 6。

<sup>⑮</sup> 〔清〕曾燦：《過日集·凡例》，《清初人選清初詩彙考》，頁 192。

<sup>⑯</sup> 〔清〕薛熙編：《明文在》，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（影印清康熙三十二年〔1693〕古澗水園刻本），集部第 408 冊，卷首。

<sup>⑰</sup> 〔清〕顧施禎：《盛朝詩選初集·凡例》，《清初人選清初詩彙考》，頁 245。

藹輯《名家詩選》，亦不用評點，因為「從來作者固難，識者亦復不易」<sup>④</sup>，懼夫批點未能得作者之意。明末吳應箕(1594-1645)認為評點不僅未能得作者之意，反而會埋沒古人精神，冤古人、誤後生：

大抵古人精神不見於世者，皆評選者之過也。弟嘗謂張侗初之評時義，鍾伯敬之評詩，茅鹿門之評古文，最能埋沒古人精神。而世反效慕恐後，可嘆也。彼其一字一句皆有釋評，逐段逐節皆為圈點，自謂得古人精髓，開後人之法程，不知所以冤古人、誤後生者正在此。<sup>⑤</sup>

章學誠(1738-1801)曾具體的指出評選家未睹刪節前的原文，不察其故，而妄加讚評，不僅未符作者原意，還導致好奇而寡識者刻意追摹，形成奇怪的文風：

夫古人之書，今不盡傳，其文見於史傳，評選之家，多從史傳采錄；而史傳之例，往往刪節原文，以就隱括，故於文體所具，不盡全也。評選之家，不察其故，誤謂原文如是，又從而為之辭焉，於引端不具，而截中徑起者，詎謂發軔之離奇，於刊削餘文，而遽入正傳者，詎為篇終之蕪峭。於是好奇而寡識者，轉相歎賞，刻意追摹，……是之謂誤學邯鄲。<sup>⑥</sup>

章氏所言正可作為「冤古人、誤後生」的註腳。

#### (四) 評點使作者無限之書，拘於評者有限之心手

另一反對評點的理由是，附加於文本上的圈評，雖說是帶領讀者閱讀，但同時也左右、局限了讀者對文章的體會，使原本具有更多可能性的文本，在圈評之下，流為評選者的一家之說，且使讀者在閱讀時，直接受到評選者的影響，「使讀者胸中主先入之意見」<sup>⑦</sup>。

周亮工即因此而反對評點，他認為「文之佳美，讀者自得之」，「章疏節釋，

<sup>④</sup> [清]吳藹：《名家詩選·凡例》，《清初人選清初詩彙考》，頁274。

<sup>⑤</sup> [明]吳應箕：〈答陳定生〉，《樓山堂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），卷15，頁173-174。

<sup>⑥</sup> 章學誠：〈古文十弊〉第十則，章學誠撰，葉瑛校注：《文史通義校注·內篇五》（臺北：漢京文化事業公司，1986年），卷5，頁509。

<sup>⑦</sup> [清]楊大鶴：〈箋註劍南詩鈔凡例〉，〔南宋〕陸游撰，〔清〕雷瑨註釋：《箋註劍南詩鈔》（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5年影印上海掃葉山房民國十九年〔1930〕石印本），卷首，頁2。

字櫛句比，而使古人之意遂止於此焉，何其視古人之甚小也」<sup>④⑧</sup>。儲欣(1631-1706)言茅坤《唐宋八大家文鈔》對讀者而言，雖有「開導後學」之效，但卻不免「錮牖其耳目」<sup>④⑨</sup>。章學誠也指出「文字之佳勝，正貴讀者之自得」，「夫書之難以一端盡也，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」<sup>⑤⑩</sup>，而讀者過於依賴評點本，「評點興，而學者心思耳目，轉為評點所拘」<sup>⑤⑪</sup>，將造成讀者「囿於見聞，不能自具心裁，深窺古人全體、作者精微，以致相習成風，幾忘其為尙有本書」<sup>⑤⑫</sup>的流弊。強勢的評點本取代了原書，評點者也壟斷了解釋權，「恐以古人無窮之書，而拘於一時有限之心手也」(〈文理〉)，故延君壽為了不受評點者想法的牢籠、能自抒心得，不讀評點本：

詩文之有圈點、批語，頗醒人心目，最混人識見。我平生看書不喜有批點者，迨自家實有不明白處，然後看注釋、講解未遲，又當再四審量，參以己見，如此讀書方能受一書之益。<sup>⑤⑬</sup>

### (五) 文無定法，反對評點將法揭以示人

評點常會解析文法，以作為讀者創作之借鑑。關於「法」的爭論，由來已久，毛先舒(1620-1688)強調：「詩本無定法，亦不可以講法。」因無定法，所以不能講法；若能大量閱讀前賢之作，深思熟慮，日積月累自然有得，也無需講法<sup>⑤⑭</sup>。雖宗唐、宗宋崇尚有異，但從閱讀前人佳作汲取創作經驗，這是許多通人推舉的學習路徑。反對評點者，也大都持文無定法、需賴讀者自得的觀念，所謂「文之短長抑

④⑧ 周亮工：〈王于一遺稿序〉，頁6-7。

④⑨ 儲欣：〈唐宋十大家全集錄總序〉，《唐宋十大家全集錄》，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(影印清康熙刻本)，集部第404冊，卷首。

⑤⑩ 章學誠：〈文理〉，《文史通義校注·內篇三》，卷3，頁64。

⑤⑪ 章學誠：《校讎通義·外篇·吳澄野太史歷代詩鈔商語》，《章氏遺書》，卷13，頁3。

⑤⑫ 章學誠：〈宗劉〉，章學誠撰，葉瑛校注：《校讎通義校注》(與《文史通義校注》合刊)，卷1，頁958。

⑤⑬ [清]延君壽：《老生常談》(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9年《叢書集成續編》本)，頁5。

⑤⑭ [清]毛先舒：《詩辯坻》，收入郭紹虞編選、富壽蓀校點：《清詩話續編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年)，頁78。

揚高下，及起伏照應，本無定法」<sup>55</sup>，「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，亦何必執一法以例天下之學者乎」<sup>56</sup>？章學誠亦云文字之佳勝，貴在讀者自得，難以告人，拈出「法」，不但對創作無幫助，而且還形成拘忌，〈文理篇〉言：

文字之佳勝，正貴讀者之自得；如飲食甘旨，衣服輕暖，衣且食者之領受，各自知之，而難以告人。如欲告人衣食之道，當指膾炙而令其自嘗，可得旨甘；指狐貉而令其自被，可得輕暖，則有是道矣。必吐己之所嘗而哺人以授之甘，摟人之身而置懷以授之暖，則無是理也。（頁 287）

詩之音節，文之法度，君子以謂可不學而能，如啼笑之有收縱，歌哭之有抑揚；必欲揭以示人，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。（頁 289）

朱庭珍(1841-1903)也認為評點、選本及詩話中所論之詩法，不過是「糟粕」，非學作詩的途徑，不如請教名師鉅手：

今人好看前哲批點諸集，及諸家選本評論，各種詩話詩法，以求作詩路徑，而不知虛心請業於名師鉅手。不知自古迄今，所有選家詩家，評語緒論，並詩話中標舉論法程，皆古人糟粕而已……。其著書論詩文法及作詩話者，多非專門名家，非自逞臆說，即附會古人，其佳者亦只略見大意，引而不發，無堪奉為師法者。<sup>57</sup>

## （六）評點好論字句等末節

黃淳耀(1605-1645)曾批評鍾惺將精力浪擲在《詩歸》的評點上：「近鍾伯敬云：『平生精力，什九盡於《詩歸》一書。』此僅賢於飽食終日者耳。」<sup>58</sup>「僅賢於飽食終日」的批評，乃肇因於「評論文字，抑揚工拙」，是「為道之末務」<sup>59</sup>的

<sup>55</sup> 《御選唐宋文醇·凡例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年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），卷首，頁1。

<sup>56</sup> 曾燦：《過日集·凡例》，收入《清初人選清初詩彙考》，頁193。

<sup>57</sup> [清]朱庭珍：《筱園詩話》，收入《清詩話續編》，卷1，頁2338。

<sup>58</sup> [明]黃淳耀：〈陶菴自監錄三〉，《陶菴全集》（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），卷21，頁12。所引鍾惺之言，見〈與譚友夏〉：「弟僦居金陵，心自懷歸。蓋平生精力，十九盡於《詩歸》一書，欲身親校刻，且博求約取於中、晚之間，成一家言，死且不朽。」《隱秀軒集》，卷28，頁472。

<sup>59</sup> 章學誠：《校讎通義·外篇·朱子韓文考異原本書後》，《章氏遺書》，卷13，頁25。按：因所據版本不同，葉瑛校注本《校讎通義》無此篇。

思維，故黃淳耀以為不值得在此等事上，耗費生命。此種「著述將以明道，文辭非所急」<sup>⑩</sup>的看法，是一般士人長久以來共同的觀念。文辭雖非所急，而論文時，能「多言讀書養氣之功，博古通經之要，親師近友之益，取材求助之方」<sup>⑪</sup>猶可，倘若斤斤於詩文之辭藻等形式，特別是一字一句之優劣，則被視為論文之末節<sup>⑫</sup>——而這些卻常都是評點的重心<sup>⑬</sup>。故錢鍾書云：「評點、批改側重成章之詞句，忽略造藝之本原，常以『小結裏』為務。」<sup>⑭</sup>

由於評點與文本結合，得以互參，所以今所見的評點本，行批、眉評常充斥著對遣詞用句細部的批評，故黃子雲(1691-1754)說：「鍾伯敬評詩，專求片詞隻字之工切而不知大體。」<sup>⑮</sup>紀昀(1724-1805)也批判方回(1227-1306)《瀛奎律髓》的評點，置詩歌的興象、寄託、溫柔敦厚之旨、文外曲致等「本原」不論，而專論字句等「末節」<sup>⑯</sup>，不管就修道、學文而言，皆為末務。

<sup>⑩</sup> 章學誠：〈與朱少白論文〉，《章氏遺書》，卷 29，頁 73。

<sup>⑪</sup> 章學誠：〈文理〉，頁 288。此為章學誠所稱「古人論文」的大方向。

<sup>⑫</sup> 不談「字句」之末務，而談論詩文該討論些什麼，諸家所說略有出入。〔清〕方世舉：《蘭叢詩話·序》云：「余少學朱竹垞先生家，見《草堂詩話》之專言杜者，凡五十家，他可知也。然可取者少，又僅以字句為言，其於學詩之大端，體格異同，宗派正變，音韻是非，絕未之及。詩話雖多奚為乎？」見《清詩話續編》，頁 769。方氏以為應談「學詩之大端，體格異同，宗派正變，音韻是非」，可與後引紀昀〈《瀛奎律髓刊誤》序〉之說合觀。

<sup>⑬</sup> 固然亦有避此流弊，而刻意就大局著眼的，如王夫之《唐詩評選》、《明詩評選》，少就一字、一句而言，通論全詩表現、作家風格比較。如陳允衡輯《國雅初集》，其〈凡例〉云：「然寧簡略，使讀者自得之。章法，是所最重；非如《詩歸》，好論字句已也。」（引自《清初人選清初詩彙考》，頁 90。原作：「然寧簡略，使讀者自得之章法，是所最重。非如《詩歸》好論字句已也。」標點有誤。）但以評點和其它以文、以詩話批評的形式來做比較，顯然評點有好論字句的特徵。

<sup>⑭</sup> 錢鍾書：《管錐編》（四）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1 年），頁 1215，「全晉文卷一〇二」條。

<sup>⑮</sup> 〔清〕黃子雲：《野鴻詩的》，收入丁福保編：《清詩話》（臺北：木鐸出版社，1988 年），頁 856。

<sup>⑯</sup> 〔清〕紀昀乾隆三十六年(1771)作〈《瀛奎律髓刊誤》序〉：「響字之說，古人不廢，暨乎唐代鍛鍊彌工，然其興象之深微、寄託之高遠，則固別有在也，虛谷置其本原，而拈其末節，每篇舉一聯，每句標舉一字，將舉天下之人而致力於是，所謂溫柔敦厚之旨蔑如也，所謂文外曲致，思表纖旨，亦茫如也，後人纖巧之學，非虛谷階之厲耶？」見《瀛奎律髓刊誤》，卷首，頁 1。

### （七）評點常是標榜的手段

評點原是取古人已傳世的作品加以圈評，後來出版商爲了吸引讀者購買，乃請人爲今人的著作評點，爲了促銷，可想而知，定多溢美之詞。亦有友朋爲之評點者，多相互標榜之辭；門人、後學所評，更不免阿諛之讚。顧炎武云：「若每作一詩，輒相褒誦，是昔人標榜之習，而大雅君子所弗爲也。」<sup>67</sup>《總目》評曹貞吉《珂雪詞》：

舊本每調之末，必列王士禎、彭孫遹、張潮、李良年、曹勳、陳維崧等評語，實沿明季文社陋習，最可厭憎。今悉刪除，以清耳目。且以見文之工與不工，原所共見；傳與不傳，在所自爲。名流之序、跋、批、點，不過木蘭之櫝，日久論定，其妍醜不由於此。庶假借聲譽者，曉然知標榜之無庸焉。  
(卷 199, 頁 18)

以爲批點等爲明末文社標榜之陋習，最可厭憎，故皆刪去。凡此皆可見明末以來標榜的陋習，及大雅君子對標榜之習的反感。

亦有作者自爲評點的，如王猷定曾「自刻其文爲之評鶩，而別以丹鉛」<sup>68</sup>，沈光裕以爲評點「施于自作詩文尤爲不可，昔言『三分詩，七分讀』，以爲笑謔，若無一分可觀，而加十分圈點，謬亦甚矣」<sup>69</sup>。因爲評點雖是美惡並陳，瑕瑜不掩，但仍以讚譽之詞居多，若自評已作，自我標榜，而無真才實學，將落人笑柄，乃賢者所不取。

### （八）評點者批書常流於率意、主觀

評點者常用自娛的心態、率意的筆調、感性的語言、主觀的態度來批書。如李贄曾再三提及其批書之樂，言：「《水滸傳》批點得甚快活人，《西廂》、《琵琶

<sup>67</sup> 顧炎武：〈答子德書〉，《亭林文集》，收入《顧亭林詩文集》（臺北：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84年），卷4，頁75。

<sup>68</sup> 周亮工：〈王于一遺稿序〉，頁6。

<sup>69</sup> 〔明〕沈光裕：〈與友〉，《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》，卷12，頁32。引述見〔南宋〕周密：「昔有以詩投東坡者，朗誦之，而請曰：『此詩有分數否？』坡曰：『十分。』其人大喜，坡徐曰：『三分詩，七分讀耳。』」《齊東野語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），卷20，頁259-260，「讀書聲」條。

瑟》塗抹改竄得更妙。」<sup>⑩</sup>又說：選輯《坡仙集》，並加批削旁註，「每開看便自歡喜，是我一件快心却疾之書，……大凡我書皆為求以快樂自己，非為人也」<sup>⑪</sup>。用「快活」、「快心卻疾」、「快樂自己」來自況評點的感受。明末馬嘉松亦云評點了事，「不禁手舞足蹈」<sup>⑫</sup>。

張潮(1659-1707)對於其評書的過程有生動的形容：「觸目賞心，漫附數言于篇末；揮毫拍案，忽加贅語于幅餘。或評其事而慷慨激昂，或賞其文而咨嗟唱嘆。敢謂發明，聊抒興趣；既自怡悅，願共討論。」<sup>⑬</sup>所謂「漫附數言」、「忽加贅語」，都是不假思索的興來之筆。孫鑛(1542-1613)亦自云評詩是「信手點之，興到即書耳」<sup>⑭</sup>。

舊題李卓吾所評的《西遊記》其〈凡例〉中自云：「碎評處，謔語什九，正言什一。」<sup>⑮</sup>馮鎮巒云：「作文人要眼明手快，批書人亦要眼明手快。天外飛來，只是眼前拾得。」並自言其評《聊齋誌異》或有遊戲之筆，「至其隨手記注，平常率筆，無關緊要，蓋亦有之」<sup>⑯</sup>。

蔡潮(1467-1549)〈六戒〉一文，舉六端以自戒，其中「戒批古書」一則云：「汝性好批書，非名讀書，欲令見我書者，譽其精博耳，此是真疾。靜咀百遍，其

<sup>⑩</sup> [明]李贄：〈與焦弱侯〉，《續焚書》（臺北：漢京文化事業公司，1984年），卷1，頁34。

<sup>⑪</sup> 李贄：〈寄京友書〉，《焚書》（與《續焚書》合刊），卷2，頁70。又可參《續焚書》，卷1，〈與袁石浦〉，文字與此略同。

<sup>⑫</sup> [明]馬嘉松：「點畫已陳，自覺眼明口迅，意況悉提，不禁手舞足蹈。」見馬嘉松輯：〈十可篇凡例〉，《十可篇》，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（影印明崇禎刻本），子部第143冊，卷首。

<sup>⑬</sup> [清]張潮：〈凡例十則〉，《虞初新志》，收入《四庫禁燬書叢刊》（影印清康熙刻本），子部第38冊，卷首。

<sup>⑭</sup> [明]孫鑛：〈與呂甥玉繩論詩文書〉，《月峰先生居業次編》，收入《四庫禁燬書叢刊》（影印明萬曆四十年〔1612〕呂胤筠刻本），集部第126冊，卷3，頁56。

<sup>⑮</sup> [明]吳承恩著，陳先行、包于飛校點：《李卓吾評本西遊記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4年），卷首，頁1。

<sup>⑯</sup> [清]馮鎮巒：〈讀聊齋雜說〉，《聊齋誌異——會校會注會評本》（一）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1991年9月），卷首，頁12。

妙自見，汝首尾未徹，紙隙已盈，批之所盡，意亦竭矣，豈不愧耶！」<sup>⑦</sup>所謂「首尾未徹，紙隙已盈」，可見不假思索，下筆之快。一部厚重的《金瓶梅》，張竹坡自云其批點並非經十年精思、醞釀，而是一時興起，於十數天內批就的<sup>⑧</sup>。紀昀嘗言：「余少時閱書好評點，每歲恆數十冊。」<sup>⑨</sup>因評點是興到之言，一年才能有數十冊之量。由以上的引述，可見有些評點者津津樂道於批書迅速之一斑<sup>⑩</sup>。

大雅之士認為文章乃經國之大業，不朽之盛事，著述為「立言」、為載道，不應只是自娛，宜慎重其事。而評點者卻坦然宣稱為了自娛，都是率意之作、是遊戲之筆、是無關緊要之言，「謔語」多過於「正言」，莫怪乎會引起非議。陳衍即對這種評點的態度無法認同，認為從事批評應有其實質的功能、目的：「所謂批評者，一則能抉古人胸中欲吐之妙，以剖千古不決之疑，一則援引商略，判然詳盡，以自見其賅博，如論漢魏而下證晉唐，如談詩賦而兼覈子史之類也。倘語意平常，不如無批。輕薄率易，尤為可厭矣。」<sup>⑪</sup>解決千古之疑，援引商略以見賅博，評點者罕以這種考證、徵實的態度自任，故以陳衍標準看來，多數的評點皆為「輕薄率易」，「不如無批」之屬。

### （九）評點本常有改易、刪節之舉

評選者常會改易、刪節所選的文本，此錢鍾書在《管錐編》中，已詳為舉證，

<sup>⑦</sup> [清]黃宗羲：《明文海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影印涵芬樓原藏鈔本），卷126，頁1265。

<sup>⑧</sup> [清]張竹坡：「此書非有意刊行，偶因一時文興，借此一試目力，且成于十數天內，又非十年精思。」見侯忠義、王汝梅編：〈第一奇書凡例〉，《金瓶梅資料匯編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頁1。

<sup>⑨</sup> 乾隆戊申(1788)八月初五紀昀又記，見《瀛奎律髓刊誤》，卷首，頁1。

<sup>⑩</sup> 雖評點本出版時，評者亦有字斟句酌、慎重其事的一面，所以鍾惺〈與譚友夏〉才會說「平生精力，十九盡於《詩歸》一書」；〈與蔡敬夫〉信中又云：「兩三月中，乘譚郎共處，與精定《詩歸》一事，計三易稿，最後則惺手鈔之。」見《隱秀軒集》，卷28，頁469。「精定」、「三易稿」都顯示《詩歸》並非一揮而就。然此當以特例觀之，袁震宇、劉明今：《明代文學批評史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年），頁529，曾評鍾、譚「如此地重視詩歌評選，實屬少見」。即便《詩歸》非速成之作，然其呈現在讀者面前時，仍不脫輕鬆、率意的色彩，此乃評點的特色、措辭用語風格使然，將之與錢謙益箋注杜詩引經據典的嚴謹態度相較，其差別顯而易見。

<sup>⑪</sup> 陳衍：〈與鄧彰甫〉，《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》，卷1，頁6。



自《文選》而下，至明、清的許多出名的選集，皆難脫悍然筆削之習<sup>82</sup>，金聖嘆尤為其中最著者。改易乃不忠於原著，毋需多言；刪節，亦或為有識之士所不取，陳衍云：「古人文字，不取則已，取則勿剪削之。彼作者苦心脈絡關紐，實暗藏字句之中，稍經裁斷，便索然矣。」<sup>83</sup>馮班(1602-1671)亦云：「讀書當讀全書，節抄者不可讀。」<sup>84</sup>陳衍是就作者而言，指出刪節是對作者苦心剪裁的破壞；馮班是就讀者而言，認為應讀全書。此外，如鍾惺、譚元春所評選之《詩歸》為後人所譏，除竟陵的詩學主張，不為後人認同，其刪節亦是一病，《總目》評《詩歸》「力排選詩惜群之說，於連篇之詩隨意割裂，古來詩法於是盡亡」<sup>85</sup>。儘管有些人較寬鬆，如張之洞可以接受對詩詞文章之類的刪節，若對諸經刪節，張之洞仍視之為「割截侮經」、不可原諒之事<sup>86</sup>。

#### (十) 評點將導致文本改變

刪節、改易，顯然是造成文本的改變，但未加刪節、改易，僅加上眉批、行批、尾評及諸多圈點符號的評點，仍是改變了文本。

章學誠反對將圈評與文本合而為一，因「就文加評，因評而加圈點識別，雖便誦習，而體例乃漸褻矣」<sup>87</sup>，〈宗劉篇〉云：批評應如鍾嶸(469-518)《詩品》、劉勰(465?-?)《文心雕龍》，「離詩與文，而別自為書」，並指出評點將改變原書的性質：

<sup>82</sup> 參錢鍾書：《管錐編》（三），頁1067-1069，「全三國文卷一六」條。言「古文選本之精審者，亦每削改篇什」，「明、清名選如李攀龍《詩刪》、陳子龍等《皇明詩選》、沈德潛《別裁》三種、劉大櫛《歷朝詩約選》、王闈運《湘綺樓詞選》之類，胥奮筆無所顧忌」。「選文較謹嚴，選詩漸放恣，選詞幾欲攘臂而代庖；一體之中，又斂於古人，而肆於近人」。

<sup>83</sup> 陳衍：〈與鄧彰甫〉，頁6。

<sup>84</sup> 〔清〕馮班：《鈍吟雜錄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，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），卷2，頁22。

<sup>85</sup> 《總目》，卷193，頁22，「詩歸」條。

<sup>86</sup> 張之洞列舉諸評點的讀本，並云：「此類各書，簡絮豁目，初學諷誦，可以開發性靈，其評點處頗於學為詞章者有益，菁華削繁，雖嫌刪節，但此乃為學文之用，非史學也。若閱本《考工記》、《檀弓》、《公》、《穀》、《蘇批孟子》之類，割截侮經，仍不錄。」見《書目答問補正》，頁338-339，附一〈別錄〉。

<sup>87</sup> 章學誠：《校讎通義·外篇·朱子韓文考異原本書後》，頁25。

且如《史記》百三十篇，正史已登於錄矣。明茅坤、歸有光輩，復加點識批評，是所重不在百三十篇，而在點識批評矣，豈可復歸正史類乎？謝枋得之《檀弓》、蘇洵之《孟子》、孫鑛之《毛詩》，豈可復歸經部乎？凡若此者，皆是論文之末流，品藻之下乘，豈復有通經習史之意乎？編書至此，不必更問經史部次，子集偏全，約略篇章，附於文史評之下，庶乎不失論辨流別之義耳。（〈宗劉〉，頁 958-959）

章氏此段討論的是圖書分類問題，言作品經過評點，所重已不在原典，而在評選者所加之點識批評。如歸有光(1506-1571)、茅坤之評《史記》，蘇洵、謝枋得、孫鑛之評經，章氏認為皆是「論文」、「品藻」之作，其文本已改變，故以為不當再歸諸正史、經部，而應「附於文史評之下」。又如清初王源(1648-1710)《或菴評春秋三傳》採評點方式「論文」<sup>88</sup>，《總目》對此書深致不滿，以為經過評點的《春秋三傳》，不當隸屬經部，「當歸總集」<sup>89</sup>。

清初楊大鶴云：「近代選刻詩文，往往細加評點，不但使作者面目成不化之妍媸，亦且使讀者胸中主先入之意見。」<sup>90</sup>所謂「使作者面目成不化之妍媸」，即是指圈評與文本結合，而改變文本原來的面貌，亦即鍾惺所言：「於古人本來面目無當。」<sup>91</sup>明末沈光裕亦言書籍「一用圈點，便成私書」<sup>92</sup>，指出書籍讓評點寄生後，已與原著不同，強加上評者的意見與文字後，猶如評點者之自著。正是由於圈評改變了文本，所以鍾惺提到與譚元春所共同選的《詩歸》一書，言：「此雖選古人詩，實自著一書。」<sup>93</sup>金聖嘆也才會大刺刺地聲明：經他所批的《西廂記》，「是聖嘆文字，不是《西廂記》文字」<sup>94</sup>。廖燕亦推許評點之功，使文章增色、別

<sup>88</sup> 如所評《三傳》之一的《左傳評》其〈凡例〉即云：「《左氏》之不合經義者，先儒駁之詳矣，茲皆不論，特論文耳。」又：「評語皆作文竅妙，一篇可旁通千百篇而無窮。」見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（影印清康熙居業堂刻本），經部第 139 冊，頁 1-2。

<sup>89</sup> 《總目》，卷 31，頁 23，「或菴評春秋三傳」條。

<sup>90</sup> 楊大鶴：〈箋註劍南詩鈔凡例〉，頁 2。

<sup>91</sup> 鍾惺：〈再報蔡敬夫〉，頁 471。

<sup>92</sup> 沈光裕：〈與友〉，頁 32。

<sup>93</sup> 鍾惺：〈與蔡敬夫〉，頁 469。

<sup>94</sup> 〔清〕金聖嘆：〈讀第六才子書《西廂記》法〉第 71 則，《貫華堂第六才子書西廂記》，收入《金聖嘆全集》（三）（臺北：長安出版社，1986 年），卷 2，頁 19。

開生面，以為文章經評點，「此文雖為他人之文，遂與己之所作無異」<sup>95</sup>。

### （十一）評者自居高明，蔑視作者

評點猶如老師評閱學生的文章，亦如考官批閱考生試卷<sup>96</sup>，評者和作者隱然形成尊卑的情勢。自古以來，對批評者就有較高的要求，如曹植(192-232)〈與楊德祖書〉：「昔丁敬禮嘗作小文，使僕潤飾之。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，辭不為也。……蓋有南威之容，乃可以論於淑媛；有龍淵之利，乃可以議於割斷。」故以「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，而好詆訶文章，掎摭利病」為非<sup>97</sup>。《文心雕龍·知音》亦云：「操千曲而後曉聲，觀千劍而後識器。」皆強調了欣賞者、評者必須和作者有同樣的素養，甚至比作者的水準更高，方有資格對作品評頭論足<sup>98</sup>。然而評點之事，常是大雅不為，或由二、三流的文章，或由塾師、陋儒操其業，而所評選的對象，又常是歷代一流的文人佳作，遂常產生由平庸者對高明者的作品下裁斷的情況，而且裁斷更直接地加諸文本之上，故評點常被視為對原著、原作者的「不敬」。

章學誠讚許摯虞(?-311)、劉勰等批評專著，「離文而別自為書」，認為此種作

<sup>95</sup> 廖燕：〈評文說〉，頁 400。

<sup>96</sup> 〔元〕劉貞仁編《類編文選詩義》，所錄《詩》義，為元代科舉考試第一場所試，此書「題後多有載考官批者，會試皆稱考官批，鄉試則稱初考覆考官批」。參見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：《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·經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3年），頁 316-317。似在元代考官閱卷已有批點之習。在明代，考官批點試卷似為常態，如楊慎《升庵詩話》卷四「邵公批語」條云：「先太師戊戌試卷，出舉子蹊徑之外，考官邵公名暉批云：『奇寓於純粹之中，巧藏於和易之內。』」《歷代詩話續編》（中）（臺北：木鐸出版社，1988年），頁 714。譚元春乙卯年(1615)鄉試落第，在〈奏記蔡清憲公前後箋札·其三〉感慨：「春又不復第，場卷點抹皆無，如未以手觸者然。」見《譚元春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卷 27，頁 756-758。由以上所述，可見考官批點考卷，為科舉制度所習見。曾國藩〈經史百家簡編序〉云：「前明以《四書》經藝取士，我朝因之，科場有勾股點句之例，蓋猶古者章句之遺意。試官評定甲乙，用硃墨旌別其旁，名曰圈點。」亦點出了科舉與評點的關係。

<sup>97</sup> 〔魏〕曹植：〈與楊德祖書〉，郁沅、張明高編選：《魏晉南北朝文論選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96年），頁 25-26。

<sup>98</sup> 錢鍾書對評者與作者的高下關係有論：「作者鄙夷評者，以為無詩文之才，那得具詩文之識，其且日臧否，模糊影響，即免於生盲之捫象、鑑古，亦隔簾之聽琵琶，隔靴之搔癢疥爾。雖然，必曰身為作者而後可『掎摭利病』為評者，此猶非馬牛犬豕則不能為獸醫也。」《管錘編》（三），頁 1052，「全三國文卷八」條。

法代表著「自存謙牧，不敢參越前人之書」<sup>99</sup>，免去評點形式對作者造成不敬。張之洞以為讀史時，忌以評點的形式直接書之卷端批評，云：「《史》、《漢》之文法、文筆，原當討究效法，然後生俗士管見俚語，公然標之簡端，大不可也。」認為「若有討論文法處，可別紙記之」。以後生俗士的管見俚語批評馬、班的大作「大不可」，史猶如此，經更慎重了。對於明人對《周禮》、《三傳》、《孟子》諸經，「以評點時文之法批之」，張氏認為：「鄙陋侮經，莫甚於此，切宜痛戒。」<sup>100</sup>

錢謙益指責當時之人：「推史則晁、壽、廬陵折抑為皂隸，評詩則李、杜、長吉鞭撻如群兒。大言不慚，中風狂走，滔滔不返。」<sup>101</sup>所抨擊的對象應是晚明之際，評史、評詩諸家，「折抑為皂隸」、「鞭撻如群兒」，則點出尊卑之勢，頗為古人叫屈。

錢謙益〈葛端調編次諸家文集序〉又嚴厲指斥孫鑛、鍾惺評經，言九經三史，前人「敬之如神明，尊之如師保，寶之如天球大訓，猶懼有隕越。僭而加評駭焉，其誰敢？……規之矩之，猶恐軼其方員；繩之墨之，猶恐偏其平直。妄而肆論議焉，其誰敢？」而「評駭之滋多也，論議之繁興也，自近代始也。而尤莫甚於越之孫氏，楚之鍾氏」。並接著指責孫氏評《尚書》、評《詩經》，鍾評《左傳》等作法，為「非聖無法」、「侮聖人之言」：

孫之評《書》也，於〈大禹謨〉則譏其漸排矣；其評《詩》也，於〈車攻〉則譏其「選徒囂囂」，背於「有聞無聲」矣。尼父之刪述，彼將操金椎以穀之。又何怪乎孟堅之史、昭明之《選》，詆訶如蒙僮而揮斥如徒隸乎？鍾之評《左傳》也，它不具論，以克段一傳言之，公入而賦，姜出而賦，句也，大隧之中凡四言，其所賦之詩也。鍾誤以大隧之中為句斷，而以融融洩洩兩句為敘事之語，遂抹之曰：俗筆。句讀之析，文理之不通，而儼然丹黃甲乙，衡加於經傳，不已慎乎？是之謂非聖無法，是之謂侮聖人之言。而世方奉為金科玉條，遞相師述。學術日頹，而人心日壞，其禍有不可勝言者，是

<sup>99</sup> 《校讎通義·外篇·朱子韓文考異原本書後》，頁26。

<sup>100</sup> 張之洞：《輜軒語·讀史忌批評文章》，收入《張文襄公全集》（北京：中國書店，1990年影印民國十七年〔1928〕刊本），卷304，頁21。

<sup>101</sup> 〔清〕錢謙益：〈答徐巨源書〉，《牧齋有學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年），卷38，頁1313。

可視為細故乎？<sup>⑩</sup>

不滿時人對班固之史、昭明之《選》，「詆訶如蒙僮而揮斥如徒隸」，錢謙益憤怒之因，正如筆者所言，評點形式是對原著的不敬。而《詩》、《書》等經書，為孔子所刪述，應「敬之如神明，尊之如師保」，豈容後人「僭而加評駁」？在錢氏看來，孫、鍾自居高明，凌駕孔子之上，故敢於任意進退聖人、聖經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？基於尊經的心情，所以，錢謙益憤怒的指斥孫、鍾「侮聖」、「非聖無法」。

## 五、評點得失綜論

### （一）評點的特色，是其優勢所在，亦是遭受攻擊的箭靶

不少詩話訴諸主觀、感性、直覺，評點率意自由的風格，與詩話最相似。章學誠曾批評詩話的寫作是「挾人盡可能之筆，著惟意所欲之言」<sup>⑩</sup>，這批評亦可套用在評點上，如評點大家孫鑛即嘗云批詩「此實人人可為」之事，邀其甥呂胤昌(1560-?)各草批一部《杜詩》相印證<sup>⑪</sup>。雖然高品質的詩話或評點，亦需仰賴學力為根基，然而「圈點批評可以全出個人的愛憎，而箋註則在考訂翔實，須有證據」，圈評「可以就全集中選評若干首，全首中選評若干句若干字，作為批評對象，而箋註則務求詳備完整」<sup>⑫</sup>。所以相較之下，學力不深、才智不逮的人，可能無力從事需徵引衆書、論述詳備的箋註工作，而從事詩話、評點的撰述，卻不難，可以取巧，但擇自己所欲言、所能言者來發揮，不必求詳備。

當評點可以「挾人盡可能之筆，著惟意所欲之言」，而評點又成為書坊出版獲利的手段時，為射利而作的評點書籍必然充斥市面，莫怪乎評點之作良莠不齊，戴名世即曾云當時所見的吳、會間所行刻本，「句句而圈其旁，語語而頌其美，其意思之所存與其法度之所在，選者茫然不知也，讀者亦茫然不知也」<sup>⑬</sup>。評點常被拈

<sup>⑩</sup> 錢謙益：〈葛端調編次諸家文集序〉，《牧齋初學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卷29，頁872-873。又，文中對鍾評《左傳》不滿的批評，又見於同書卷八十三〈讀左傳隨筆〉，措辭相近，不贅引。

<sup>⑪</sup> 章學誠：〈詩話〉，《文史通義校注·內篇五》，卷5，頁560。

<sup>⑫</sup> 孫鑛：〈與呂甥玉繩論詩文書〉，頁55。

<sup>⑬</sup> 黃永武：《中國詩學——考據篇》（臺北：巨流圖書公司，1977年4月），頁76。

<sup>⑭</sup> 戴名世：〈唐宋八大家文選序〉，頁64。

出錯誤，被批評識見不高、率意主觀的情況，尤逾其它的批評形式，遂影響世人對評點的總體評價，而遭到有識之士所鄙，所以上一節中，反對評點的陣容，顯得那麼壯觀；批評的聲浪，那麼理直氣壯。

本文關於贊成、反對評點的討論，大都取材於士人、知識分子之議論，一般略能識字讀書的市井小民、文化水準不高的學子，或在學習上剛起步的童蒙，對評點的態度，想必是支持、歡迎的居多，正是由於程度不高，才需仰賴評點者領航，所以書坊評點的書籍與日俱增。清初朱觀指出：「前代詩選，大約無評點者多，近選俱尚評點。」所以他選《國朝詩正》時，只好「從眾」，使用評點<sup>⑩</sup>。藉朱觀「近選俱尚評點」一語，可略窺明清之際，詩文評點逐漸盛行的狀況。

而由以上關於贊成、反對評點的討論看來，知識分子中，似乎反對評點的聲音，遠比贊成的多。然而評點的出版市場卻不見萎縮，蓋因大雅之士在整個人口結構來說，畢竟是少數。眾多文化水準不高的民衆需求，促使出版商以評點來招徠顧客，偽稱名家評本的書籍也充斥市面。評點流行的風潮，並不是大雅之士的反對所能扭轉的，更何況其所持的反對意見，亦有可商榷之處。

譬如以評點非古制為理由而反對評點，楊倫就相當不以為然，他認為評點是「畫龍點睛，正使精神愈出，不必以前人所無而廢之」<sup>⑪</sup>。廖燕的批駁更直接，對時人或執《昭明文選》之古例，只選不評，認為是「借《文選》之例，以藏其拙」，「使尚執《文選》之例以律今時，評點概置不用，是猶欲今人草衣木食，以與太古比德也，可乎哉」<sup>⑫</sup>！方東樹亦反對時人以為去掉圈評方為大雅之說，〈書歸震川史記圈點評例後〉云：「夫圈點評抹，古人所無，宋明以來始有之，去之以為大雅，明以前所無，國朝諸公始為此論。吾以為宇宙亦日新之物也。後起之義，為古人所無而不可蔑棄者，亦多矣。」（頁 41）黎庶昌（1837-1897）云：「後世之變，何所不有？」故「不以古之所無，非今之所有」，仍採用評點<sup>⑬</sup>。諸人之反駁有力，若因古所無故今不可有，則當廢者多矣。

至於所謂批點沿時文俗態、為科場陋習，是受當時科舉用書普遍使用評點的株

<sup>⑩</sup> [清]朱觀：《國朝詩正·凡例》，收入《清初人選清初詩彙考》，頁 287。

<sup>⑪</sup> 楊倫：〈杜詩鏡銓凡例〉，《杜詩鏡銓》（臺北：華正書局，1981 年），卷首，頁 15。

<sup>⑫</sup> 廖燕：〈評文說〉，頁 400。

<sup>⑬</sup> [清]黎庶昌：〈續古文辭類纂序〉，舒蕪等編選：《近代文論選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99 年），頁 315-316。

連，因此而否定這種批評方式，似乎也略欠妥當。呂思勉(1884-1957)強調：「以圈點評騭文字，亦實足以顯出精彩，開示後學，……至世俗所用圈點，誠十九妄陋可笑。然此乃用之者不善，非圈點之咎也。」<sup>⑩</sup>吾人並不能因「用之不善」而斷然質疑此一批評形式的價值。

又如未能掌握作者之意的指責，不獨使用評點方有此流弊。評點者學養之高下及領略文本能力之優劣，讀者與評點者理念是否相近，在在都左右了評者是否掌握作者之意的評價。如《瀛奎律髓》一書的評點，紀昀曾致不滿，略有微辭。吳寶芝卻以為評者「其所圈識，如與作者面稽印可，能使其精神眉目，軒豁呈露於行墨之間」<sup>⑪</sup>。「如與作者面稽印可」，即讚揚其能掌握、闡發作者原意，可見對同一部評點本評價的殊異。

而將法揭以示人，雖有拘忌之弊，「但初學文理，必使之有法可循」<sup>⑫</sup>。反對評點者常倡言使讀者「自得之」，仁者見仁、智者見智云云，今人吳宏一教授認為這類的高論：「可與上智證道，難與下愚明言，初學者及鈍根的讀者仍然有待他人解說，才能了解這些作品的好處。」<sup>⑬</sup>姚鼐又云：「文家之事，大似禪悟，觀人評論圈點，皆是借徑，一旦豁然有得，呵佛罵祖，無不可者。」<sup>⑭</sup>認為閱讀評點本，對許多人來說是學習寫作有效的方法，只是作為學習過程中的「借徑」，而非以法來縛人手腳，形成拘忌。

而評點會改變文本、主觀、率意、好論字句之優劣，使作者的原意受到評者的局限……，某個角度看來，這些也正是不同於其它批評形式的所在。就文圈評，有便於誦習的好處，就無法避免改變文本、印定後人耳目的流弊。評點便於標舉文法、點出字句優劣，以迎合童蒙的需要，就難免招徠通人捨本逐末之譏。章學誠讚賞摯虞〈文章流別論〉、鍾嶸《詩品》、劉勰《文心雕龍》，能離詩文，而別自成書，故能成一家言，反對真德秀(1178-1235)、謝枋得，因文圈評的作法<sup>⑮</sup>。然而，若真德秀、謝枋得，將論文評語集結另成一書，即不再謂之評點本了，也失去了評

<sup>⑩</sup> 呂思勉：《章句論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77年），頁48-49。

<sup>⑪</sup> 吳寶芝：〈重刻律髓記言〉，頁1-2。

<sup>⑫</sup> 〔清〕林傳甲：《中國文學史》（臺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頁122。

<sup>⑬</sup> 吳宏一：《清代詩學初探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86年），頁148。

<sup>⑭</sup> 姚鼐：〈與陳碩士〉，《姚惜抱尺牘》，收入《明清名人尺牘》，頁44。

<sup>⑮</sup> 章學誠：〈宗劉〉，頁958；《校讎通義·外篇·朱子韓文考異原本書後》，頁25。

點本既有的一些優勢，必定也會減少許多讀者。

## （二）評點得失互見，應就評點本的優劣分別論之

方東樹反對自詡名流者，矜其大雅，「謂圈點抹識批評沿於時文儻氣，醜而非之」，甚至責諸評點大家之評為陋、為批尾之學的看法，方氏認為：「古人著書為文，精神識議固在於語言文字，而其所以成文義用或在於語言文字之外，則又有識精者為之圈點抹識批評，此所謂筌蹄也。能解於意表而得古人已亡不傳之心，所以可貴也。」並強調要以評點的品質論定，不能全盤否定所有的評點本，「圈點抹識批評亦顧其是非得真與否耳，豈可竝其真解意表能得古人已亡不傳之妙者而去之哉！」（〈書歸震川史記圈點評例後〉，頁 40-41）。

黃汝亨 (1558-1626) 肯定評點的作用，言書之有評，「猶廷尉之覆駁，老吏之獄究；其為批點，猶畫家之點眼，堪輿家之點穴，皆的有所據」；然亦指斥一些不入流的評點為古書之罪人：「不該不洽，乃求似于形容膚澤之間，或輕為標榜，句比字櫛，或轉相蹈襲，巧翻隙鬥，如村學童子師之為，甚至青黃赤碧，以相塗飾，有如兒戲，皆古書之罪人也。」<sup>⑩</sup>陳弘緒 (1597-1665) 賞謝枋得、茅坤等人之評書，「皆以著書之精神而為批閱」；也指責草率評點者，使「古人之精神，反因我之點抹議論而湮沒矣。夫點抹議論，本以顯古人之精神，而其弊至於反使古人之精神湮沒，則不如去其點抹議論之為愈。」<sup>⑪</sup>陳允衡 (1622-1672) 編《國雅初集》，其〈凡例〉云：

古人選詩，原無圈點。然欲嘉惠來學，稍致點睛畫頰之意，亦不可廢。須溪閱杜，滄浪閱李，不無遺議。但當其相說，以解獨得肯綮處，亦可以益讀書之智。顧東橋《批點唐音》，不靳深切著明者，惟恐後學趨向悠謬，必矩于正，則圈點不為無功。若近人滿紙皆圈，逐句作贊，究不知其風旨所在，反令目眩心駭，將為蛇足乎。<sup>⑫</sup>

<sup>⑩</sup> [明]黃汝亨：〈批點前漢書序〉，《寓林集》，收入《四庫禁燬書叢刊》（影印明天啓吳敬等刻本），集部第 42 冊，卷 1，頁 12-13。

<sup>⑪</sup> [清]陳弘緒：〈與張天生書〉，《陳士業先生集·石莊初集》，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》（影印清康熙二十六年〔1687〕刻本），第 54 冊，卷 4，頁 53-54。

<sup>⑫</sup> 陳允衡：《國雅初集·凡例》，收入《清初人選清初詩彙考》，頁 90。



諸人皆能對優劣不同的評點本分別評價，既指出評點之佳者，能畫龍點睛，有益讀書之智，可顯古人之精神，「圈點不為無功」；也抨擊「滿紙皆圈，逐句作贊」，不佳的評點為「蛇足」，足以湮沒古人之精神，為古書之罪人，不如去其評點云云。能就評點本優劣的不同給予評價，是對評點較客觀的態度。

綜觀上節反對評點的引述看來，章學誠可謂批判評點的大將，反對、指責評點的議論特多。儘管如章氏對評點這麼有意見的人，也非百分之百的反對評點，也不認為評點的書籍一無可取。他指出評點用於啓蒙的教材上無可厚非<sup>⑳</sup>，說真德秀評選的《文章正宗》「就文而為評論，旁識而出圈點」，「指示蒙學，良亦有功」。又言一些大家的選本，「其藻鑿之審，評論之工，圈點標識之醒豁精切，未嘗不可資人神智」<sup>㉑</sup>。在〈文理〉篇中，他譏貶歸有光的《史記》評點，不遺餘力，云：「歸震川氏取《史記》之文，五色標識，以示義法；今之通人，如聞其事必竊笑之。」但又言：「然為不知法度之人言，未嘗不可資其領會。」坦承「大雅所鄙」的評點，對於啓蒙、對於不知法度之人，亦有資人神智、領會的助益。由此可見，章氏雖對評點這種批評形式，有許多的不滿，但仍以為好的評點本，是學習詩文的過程中，有益的教材。

前曾引述朱庭珍《筱園詩話》反對藉批點書籍及諸家選本評論，作為學詩路徑，以為此類書籍「多非專門名家，非自逞臆說，即附會古人，其佳者亦只略見大意，引而不發，無堪奉為師法者」，皆古人糟粕，而非精華所在。讀書至此，會認為朱氏是評點的反對者，但朱庭珍又曾稱讚紀昀所批評的五家詩集及諸選評本：「剖晰毫芒，洞鑿古人得失，精語名論，觸筆紛披，大有功於詩教，尤大有益於初學。有志學詩者，案頭日置一編，反覆玩味，可啓發聰明，銷除客氣，自無迷途之患。蓋公論詩最細，自古大才粲粲，未有不由細入而能得力者。但須看公批點全本，觀其圈點之佳作以為法，觀其抹勒之不佳作以為戒，方易獲益。」<sup>㉒</sup>對紀昀批點的著作讚譽有加，以為有功於詩教，有益於初學，有志學詩者，可由此入門云云。前一筆資料勸誡讀者不可藉評點本作為學詩的路徑，後一筆又說紀昀評本大有

<sup>⑳</sup> 《校讎通義·外篇·吳澄野太史歷代詩鈔商語》：「評點始於宋人，原為啓牖蒙學設法，固不可以厚非。」（頁3）

<sup>㉑</sup> 章學誠：〈清漳書院留別條訓〉，頁673。

<sup>㉒</sup> 朱庭珍：《筱園詩話》，卷1，收入《清詩話續編》，頁2338、2347。

益於初學，可免於迷途，乍看似乎矛盾，其實不然。朱庭珍雖對評點有所不滿，但那是針對許多不佳的評點本及流弊而發，如紀昀所批能「洞鑒古人得失」的優良評點本，仍予以肯定。

## 六、結 論

本文先略述評點的起源，以及至明代評點蓬勃發展的狀況。第三、四節透過明、清士人的言論，整理出土人贊成及反對評點的原因。贊成評點者，大都因為評點本可使讀者獲得啟發，幫助讀者了解作者與文本，且評點可與文本互參，可提升學習效率，頗便於初學。反對評點的原因很多，或以為其非古制，為時文陋習，是標榜的手段，或質疑其批書的態度流於率意主觀，未能掌握作者原意，置大體而好論字句等末節。又，評選常有刪節、改易之舉，且評點與文本結合將導致文本的改變，將原為無限可能的文本，牢籠為評者的一家之說。評者自居高明、蔑視作者，施之於經史上，尤為大雅之士所難以接受。

在第五節綜論評點的得失中，筆者指出，由於從事評點，如同撰作詩話一樣，「挾人盡可能之筆，著惟意所欲之言」；再來，為了射利，出版商常以評點為手段以招顧客之青睞，所以也造成評點本良莠不齊的現象，易形成種種落人口實的流弊。通人之譏貶，殆非無因。然而也進一步辨證前人所持的反對理由，亦有可商榷之處，以及評點本的既要迎合便於初學的需要、保有評點與文本互參的特色，就難以避免因此而衍生的流弊和遭受批評的際遇。

再透過黃汝亨、陳弘緒、陳允衡、章學誠、朱庭珍等對評點有肯定、有批評的言論，強調今人在討論評點時，不應受到當時許多強烈反對評點言論的左右，而蔑視了此一批評形式。事實上，儘管是一些反對評點的大雅之士，也會因評點本的精良及作為啟蒙教材之需，而肯定評點本的價值。而從明、清兩代的書籍競尚評點的情況，也證明了評點本迎合了大眾的需求，其價值和影響自是不可輕估。